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日本學

第一輯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 本 学

第 一 辑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日 本 学
第 一 辑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许耀明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68 千字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ISBN 7-301-00117-7/C·010

定价:6.10元

前 言

《日本学》是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论文集。它的宗旨是,对日本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方面的特点。故命名为《日本学》。

研究日本学必须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全面观察日本,而不失之偏颇,才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日本,客观地评价日本。《日本学》采取这种态度。

一国的特点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比较必须是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的方法既可以采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传统方法,也应该吸取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新鲜方法和现代化手段。《日本学》提倡并突出比较研究、学际研究,重视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

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按照某种主观意图去剪裁甚至曲解事实,这种削足适履式的为现实服务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提供正确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正确解释,是学术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唯一正确途径。《日本学》坚持这一原则。

日本学的定义、内涵,乃至其能否构成一个学科,人们意见未必一致。尽管如此,日本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对象,并且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应该积极吸取国内外各学派的日本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应照搬,不应人云亦云,做传声筒。历史证明,照搬、当传声筒只会扼杀创造性。《日

本学》的目标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日本学。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国日本研究者的坚毅的努力。《日本学》虽然主要反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但它并不是狭隘的同仁出版物。《日本学》实行开放的方针,热忱欢迎国内外日本研究者在这块学术园地上发表论著,交流见解,展开争鸣。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学》编辑委员会

1988年10月

目 录

- 王学珍主任在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
- “和魂洋才”与“中体西用”的比较
——兼论“全盘西化”…………… 李廷举 (3)
- 试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战争
——戊辰战争的民族特色…………… 宋成有 (22)
- 日本的法系与日本人的法律意识…………… 吴擢英 甘超英 (41)
- 日本传统汉学在明治时代的命运
——日本近代文化运动的经验与教训…………… 严绍璁 (52)
- 勤奋的动力是什么？
——浅谈文化传统对日本人性格的影响…………… 庞春兰 (71)
- 横滨港口城市农业地位的变化…………… 田万苍 (85)
- 日本现行青少年法规剖析…………… 康树华 (98)
- “汉文化圈”论纲…………… 陈玉龙 (117)
- 幕末日本人怎样看中国
——1862年“千岁丸”上海之行研究…………… 王晓秋 (140)
- 1947—1949年美国战后对日基本政策的制定…………… 李寒梅 (157)

文化冲突与夏目漱石笔下的“多余人”……………	柴 森(173)
论岛崎藤村的《破戒》……………	周 力(191)
小说神髓(节录)……………	〔日〕坪内逍遙著 刘振瀛译(206)

日本文化论(摘译)……………	〔日〕梅原猛著 魏常海译(230)
日本的称“道”文化……………	贾蕙莹(243)

日本推理小说与清代考据之学

——一种文化比较……………	周一良(261)
---------------	----------

中日“大化改新”学术讨论会

日本人的大化改新观……………	〔日〕佐藤宗谔(267)
大化改新的主体势力与部民制……………	〔日〕鬼头清明(272)
东亚形势与日本……………	〔日〕铃木靖民(276)
关于公地公民制……………	〔日〕吉村武彦(282)
大化改新后的阶级状况……………	〔日〕门胁禎二 佐藤宗谔(288)
大化改新后日本社会的性质……………	〔日〕原秀三郎(293)
“改新之诏”系原诏论……………	沈仁安(297)
从“王土”思想在日本的发展看	

大化改新诏书的可靠性……………	王家骅(309)
-----------------	----------

唐、日民户授田制度相异问题试释

——均田制与班田制比较研究之一……………	宋家钰(318)
----------------------	----------

鸿胪馆遗迹重见天日……………	舒 父(331)
日本法律界关于保护培养青少年条例的争论……………	康树华(335)
一次有意义的学术交流……………	陈文寿(338)

0 日中古代文化关系的新思维

——评严绍璁先生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

..... [日]岩睦造 硯 (341)

1 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新进展

——评《近代中日启示录》..... 林代昭 (346)

填缺补白,别具一格

——评《日本历史辞典》..... 任清玉 (351)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357)

编 后..... (358)

王学珍主任在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北京大学在日本研究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扎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大学在全国高等院校中，是最早成立日本语言文学教研室、开设各种有关日本的课程的学校之一。我们培养的这方面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分布于外交、贸易、新闻以及科研、教育等各种岗位，很多人已成为这些方面的骨干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最近 10 年，我们在日本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绩更是显著。我校文科各系各研究所从事日本研究和教学的人员有五十余人，10 年来他们发表出版的专著、译著和论文达二百多种。他们是日本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有些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在有关日本研究的国际交流方面，各系各研究所曾经多次举办过有中日双方学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和报告会；我们已经和日本许多大学、科研机构等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交流关系，互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至于来我校短期访问和交流的日本学者和各界人士更是日益频繁。我校在同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方面承担着重要的任务。

我们在日本研究方面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缺少一个全校性统一协调的组织，从而影响了我校日本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早在三、四年前就考虑酝酿成立这样一个全校性的学术机构。

今年是我校建校 90 周年大庆,又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10 周年。我们根据全校从事日本研究人员的愿望和要求,在国家教委和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决定成立这个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日本的学术机构。它的重要任务是组织和协调全校的日本研究规划,开展校内外和国内外的日本研究的学术交流。其宗旨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一步加强和促进我校的日本研究,从而有助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助于增进中日人民的友谊,有助于发展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

我相信在我们全体同人的积极努力下,在国家教委和学校的领导下,在各系各研究所以及国内外的朋友和同行的支持和关怀下,我们的目的是一定可以达到的。

今天参加我们中心成立大会的有国家教委的负责同志、北京大学的领导同志和兄弟单位的代表,在京的日本研究方面的知名人士和各界朋友,另外还有日本驻我国使馆的各位先生,日本驻京商社的代表以及日本新闻界的朋友。对他们的光临,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同时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在座的领导、同志和朋友们介绍一下我的同人——中心的主要领导成员,希望大家能对他们的今后工作多多给予支持和帮助。

谢谢各位。

1988 年 4 月 22 日

“和魂洋才”与“中体西用”的比较

——兼论“全盘西化”

李廷举

19 世纪的洋务派，曾在“中体西用”的旗号下建工厂、修铁路、设译馆、办新学，这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未尝不是一大贡献。然而，以甲午战争为转折，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骤然逆转，“中体西用”在一夜之间便沦为历史上的神话。

甲午战争的胜利者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也曾流行过一个与“中体西用”非常类似的口号，这就是“和魂洋才”。日本借助于“和魂洋才”走向现代，而中国的“中体西用”却成了现代化的包袱、阻碍。这是一个历史之谜。要解开这个谜，就必须透过口号的面纱，到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中寻找日本与中国的差异。

于是我们发现，“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在字面上虽然非常近似，实际上却是反映了东方人的两种不同的科学观、文化观。它们貌合而神离，旨趣全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一、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

首先讨论一下“和魂洋才”这个概念的来历。什么是“和魂”？“和魂”就是大和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什么是“大和”？“大和”这个词的来源可备两解，一说是来自我国的古籍《易·乾》，意思是一切事物都应保持调和状态。另一解似乎对日本人不光彩，但也许更符合历史真情：“和”即“倭”。“和”、“倭”这二字在日语

中均读作“wa”，“和”实系来自“倭”的谐音。我们知道，中国古时把出现在日本列岛上的一些小国称作“倭”，带有蔑视的意思。随着日本人的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他们自然是不甘心于“倭”的地位，于是就把“倭”改写为“和”，从而出现了名之为“大和”的国家。

大和政权大约出现在公元3世纪。公元5世纪，大和政权统一了日本。大和的倭王虽握有雄厚的势力，却仍以中国的属臣自诩。当时既没有“天皇”，也没有什么“固有的民族精神”。如果一定要说有“和魂”的话，那就只能是“汉魂”、中国之魂，即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文化传统。从“中国之魂”演化为“和魂”，又从“和魂汉才”演化为“和魂洋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融合过程。

在明治以前的日本历史上，日本人同外来文化的遭遇主要有以下四次：(1)公元前3世纪末，因输入先进的中国大陆文明，促成了绳纹式文化到弥生式文化的转变，从而实现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技术革命。(2)公元6—9世纪，伴随佛教文化的传入，中国的科学、文物、教育、法制，全面、系统而又迅速地在日本传播开来。在这中间，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权力机构，并以大唐国为模式，制定了日益完备的律令制度。(3)公元16世纪中叶，“南蛮科学”和基督教文明开始传入日本，使在日本扎根了上千年之久的中国古典科学第一次遭到异质文明的冲击。(4)公元18世纪，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执政(1716)之后，发布享保新令(1720)，放松禁书制度，并提倡学习荷兰语，对西方的科学文化采取了机智的调和态度，从而促成了兰学在日本的繁荣。

从这四次遭遇来看，日本人迎接外来文化的方式与中国显然不同。例如，印度的佛教文化开始传入中国时，只有依附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对中国原有文化施加影响。与此相

反,中国大陆文化开始传入日本时,由于日本尚未形成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确切地说,当时尚未形成民族文化的本体意识,因此,不是外来文化依附于本土文化,而是本土文化依附于外来文化,从而决定了本土文化的取向。

民族文化本体意识的缺乏,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并非坏事。在公元前3世纪末,黄河流域的中国人早已确立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而在当时的日本列岛上,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文字,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农业耕作。正是这种落后状态,使日本早期的发展显然有别于中国、古希腊等文明古国。在这些文明古国,一般是先经历青铜器文化,然后再进入铁器时代。然而在日本却是借助于汉族的大陆文化,跳过了青铜器文化,从绳纹式文化直接进入了属于铁器时代的弥生式文化。依靠输入外来文化去实现跳跃式的发展,是淀积在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美好的记忆,一直保留到今天。由此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文化发展模式,日本学者称其为“蛙跳式战略”。

日本民族文化的本体意识,是在公元6—9世纪的第二次文化遭遇中逐渐形成的。当时恰值中国的隋唐时期。

从后汉到隋唐的统一,是中国的动乱时期。在这期间,有许多大陆移民为了逃避战乱而归化到日本,称之为“部民”。这些人有的能书善写,有的精于冶炼、制陶、织锦,具有很高的文化和技能,因而受到大和朝廷的礼遇。及至圣德太子(574—622)执政之后,崇佛尊儒的倾向极为显著。圣德太子不仅是个摄政王,也是个了不起的学者。他谙熟儒、法、道各家的古典,并悉心于佛教教义的研究。在他的影响下,佛教受到朝廷的保护,承担了维护天皇制的神圣使命。伴随佛教文化的传入,以儒学为核心的汉学成了日本精神文明的支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江户时代。

一个民族一旦有了自己的精神文明(不论这文明来自何处)

就要或多或少地对其他异质文明产生某种拒斥作用，日本也不例外。对异质文明的拒斥作用，是民族文化本体意识的反映。在圣德太子的行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本体意识。例如，大和国本来并无“天皇”的概念，圣德太子在公元608年派使者小野妹子前往隋朝时，在所携国书中居然出现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字样。这就等于告诉中央大帝国：我们已经不再是寄人篱下的“倭王”，而是与你们平起平坐的“天皇”了。尽管“天皇”这个词本源于中国的道教，日本人却不妨拿来作为与中国母体文化对抗的手段。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所谓大和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本来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汉学。按理说应当称其为“汉魂”。但是由于民族本体意识的增强，又促使日本人对来自中国的母体文化本能地采取了拒斥态度。既虔敬地接受，又忸忸怩怩地拒斥，这是一个悖论，从这个悖论中产生了“和魂”的概念。把“汉魂”说成是“和魂”，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不诚实，其实客观地说，这无非是外来文化已经堂堂正正地转化为本体文化的一个告白。

传至日本的汉学，大约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的范畴。“体”获得了“和魂”的地位之后，归属于“用”这一范畴的工艺、技巧之类，就作为依附于“和魂”的“汉才”保留下来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一切外来文化，不论精神的也好，物质的也好，都可在“才”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自由引进。如果有一天发现外来文化中有某种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仍不妨把它提升到“魂”的地位；同样，如果有一天发现汉学中有某种不适用的东西，便不客气地把它拒之于“和魂”的门外。“魂”和“才”的这一自由转化机制，来源于同中国传统文化相交往的历史经验，日本古代学者称其为“和魂汉才”。

由于日本人已经有过两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往的经验，

并从此经验中形成了“和魂汉才”的观念，所以当西方文化开始闯入日本时，便得心应手地把“和魂汉才”的经验拿来应付洋人。

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泽维尔(F. Xavier, 旧译沙勿略, 西班牙人)在鹿儿岛登陆，第一次把欧洲基督教文明传入日本。伴之而来的则是以天文学为主体的“南蛮科学”。

耶稣会是天主教中比较开明的一派，它的传教士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很好的自然科学训练，也较富于人文主义倾向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发现日本人对自然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就从兴办科学教育入手，传播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以来的天文、宇宙、气象等各种自然知识。尽管这些知识基本上属于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旧时代的遗产，但从思想体系上来说，它毕竟是西方的，而不是东方的。例如，日本人过去一直相信朱子学派的“天圆地方”说，而传教士戈梅斯(Gomez, 西班牙人)却在《天球论》(1595)中声称地球是圆的。于是就引起了两种异质文化间的冲突。

日本人既已有了“和魂汉才”的观念，所以处理这一冲突的办法也比较圆滑。一般地说，日本人在处理具体的学术问题时，并不简单地否认西方的一切成就，而是采取了一种比附、妥协的方式来调和东方和西方的矛盾。这种调和主义，在1650年出现的《乾坤弁说》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名义上是张扬儒家学说、批判南蛮科学，实际上却是比较忠实地介绍了南蛮的学术成就，从而暴露了儒家的软弱。这种圆滑的调和术在日本近代、现代史上屡见不鲜。

日本同外来文化的第四次遭遇，出现在严峻的锁国时期。在这期间形成了兰学，并从兰学的土壤中生出“和魂洋才”的观念。

日本的锁国开始于江户时代。在江户时代初期，幕府曾一度默许基督教的传播。后因荷兰、英国两个新教国家的插足，促使

幕府采取了驱逐耶稣会传教士的政策,最后导致严密的锁国体制(1639)。日本的锁国同中国的锁国比较起来,不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严酷性上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朝的锁国如从康熙56年(1717)算起,到鸦片战争为止,也不过123年。日本的锁国如从1639年算起,到1853年开国,达214年之久。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在严密的锁国体制下,居然爆发出一场颇有声势的兰学运动。

这里没有篇幅去讨论兰学的源流,但我们要提出一个观点:兰学这个意外的历史事件,可能是解开近代日本之谜的一个关键。

出现在18世纪的兰学,是日本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表面上看,中国和日本在18世纪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中国清初出现了一个开明皇帝康熙(1654—1722),日本幕府则有过一个热衷于西方学术的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中国在乾嘉年间出现了复古考证之风,日本则伴之出现了_{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如此等等。然而,中国毕竟不曾出现兰学那样的历史现象。惟其如此,中国才只能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而不能有“明治维新”;只能有“中体西用”,而不能有“和魂洋才”。

“和魂洋才”作为一个魅人的口号,流行于明治维新前后,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则是伴随兰学的发展而获得其特殊含义的。日本学者通常认为,这一观念起于德川幕府的一位儒学家、政治家新井白石(1657—1725)。在新井白石那个时代,幕府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对外关系危机。日本人受对外危机意识的驱使,一方面要强化锁国体制,同时又要有条件地开放兰学,以便洞察西方国家的动向。以此为背景,新井白石于1715年撰有《西洋纪闻》一书。他在书中援引了《易经》中的语言,认为西学“只是精于形器”是属于“形而下”的东西;“形而上”的“道”在西学中是幼稚

的，不足取的。新井白石从儒家的观点出发，把“道”、“魂”与“器”、“才”加以区别，表明他在理论上尚未给西学以充分肯定的评价。然而在行动上，他却通过《西洋纪闻》等著作，积极宣传了西方国家的风土文物知识，使后人愈来愈倾心于西方学术的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双重性，与南蛮科学时代表现在《乾坤并说》一书中的调和态度，可说是一脉相承。

到19世纪上半叶，日本对外关系的危机发展到更加尖锐的地步。攘夷派和开国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当时，幕府统治者中受过兰学熏陶的人，多有明显的开国意向。他们目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痛教训，决心走上一条有别于中国的道路。另一方面，固守封建体统的顽固派们，则多醉心于“尊王攘夷”，他们在幕府统治层中的势力也还相当强大。这时，“和魂洋才”的观念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佐久间象山（1811—1864）的所谓“西洋艺术，东洋道德”。

表面上看，“西洋艺术，东洋道德”这个口号仍然是把“道”、“魂”和“器”、“才”加以区别，并表示了对“东洋道德”的尊重。实际上，在开国派的骨子里，最要紧的还是西方学术；对“东洋道德”的推崇，不过是缓和与攘夷派冲突的一个遁词罢了。既然过去能在“汉才”的名义下偷运“中国之魂”，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在“洋才”的名义下偷运“西方之魂”呢？在日本人看来，是否把它们称之为“道”、“魂”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重要的是如何灵活运用来自“和魂汉才”的一条经验，这就是“魂”和“才”的自由转化机制。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借助于这一自由转化机制，不仅在政治上减轻了与保守势力的摩擦，也松弛了民族文化本体意识对外来异质文化的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流行的“和魂洋才”观念，实际上是“和魂汉才”观念的翻版，是两千年来同外来文化遭遇的历史经验的总结。